

欧洲思想史译丛

复旦大学世界史译丛

主编 李宏图



# 现代欧洲思想史 ——新评价和新视角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美] 纳米尼·拉卡普拉 [美] 斯蒂文·L·卡普利 编  
(Dominick LaCapra) (Steven L.Kaplan)

王加丰 王文婧 包 中 等译

014033983

B5  
137



# 现代欧洲思想史

| 新评价和新视角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美] 纳米尼·拉平普拉

(Dominick LaCapra)

[美] 斯蒂文·L·卡普兰

(Steven L.Kaplan)

王加丰 王文婧 包中等译

图书馆 藏书



人民出版社

B5/137



北航

C1722150

责任编辑:贺 畅  
责任校对:吕 飞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27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美)拉卡普拉,(美)卡普兰主编;  
王加丰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欧洲思想史译丛/李宏图主编)

ISBN 978-7-01-012247-2

I. ①现… II. ①拉…②卡…③王… III. ①思想史-欧洲-现代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170 号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1982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现代欧洲思想史

XIANDAI OUZHOU SIXIANGSHI

——新评价和新视角

[美]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美]斯蒂文·L.卡普兰 主编  
王加丰 王文婧 包中 等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247-2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译丛总序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迈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迸发出对阅读西方思想史论著的热情，希冀在思想观念层面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定位并形成一种建构性的力量。由此也带动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迅速升温，有如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形容文化史研究曾经有过的地位：“从地窖到阁楼”，而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而言，则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如剑桥学派、概念史、新文化史，还是对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称谓的论辩，以及对思想家和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无不反映着思想史研究渐入佳境。特别是2012年中央高层领导对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推荐，不仅引发了各种解读，也带来了托克维尔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热潮。

正是这持续十来年的西方思想史研究热潮，推动了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前行，也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为什么今日的学界要执着地研究看起来已经久远的西方思想？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众为什么开始如此关注遥远的西方思想？而作为西方思想史研究者，我们必须在这一热潮中保持一分清醒，探究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真义之所在，而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进行随意的图解，甚至非历史的比附。

由此，也就需要回答：西方思想史研究究竟意义何在？历史研究能否为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的答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思想史是为了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寻延续至今的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以便解决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困境。例如历史学家伍德就认为，人们在过去对解决社会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和思考也许有助于当代社会的人们。而剑桥学派的代表昆廷·斯金纳则认为，上述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认为在思想史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

的永恒问题；二是将历史当成直接解决我们自身当下问题的重要资源，具有其现实主义的功用。他以研究霍布斯的思想为例写道：企图理解霍布斯的理智世界，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业，但如果希冀把他的文本当作一面镜子映照我们自身当前拥有的各种假定和偏见，则很难让人产生真正的兴趣。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霍布斯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和奇异，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寻求解决我们自己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转向他的世界，不用说，我们将会使我们自己的理智生活走向枯竭。一个更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一种不太强烈的“关联”感来对待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越展开，越会获得某种历史的视野，这将会帮助我们抵御当前的某些假定和思想习惯，并促发我们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对过去的研究，当它揭示出与当前的种种对比甚至差异，而不只是说明与当前的种种延续性时，并非一定只有较小的启发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如何对待政治和社会的概念能够使我们审视目前那些仿佛非常棘手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问题。试图从思想史中直接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自己具体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观点将会给我们一个警醒，研究者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结论提供给社会民众，而是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在历史的实践中各方力量如何参与其中，他们又是在什么思想观念的引领下进行着这些实践，为什么有些实践成功了，甚至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安排，而有些失败，以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思想史的复杂就在于，尽管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性内容已经不再存在，但其思想观念也许从未消失，不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同样，思想史更为迷人之处在于，即使一些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本身也是吸收融合了其他思想观念之后形成的，有如18世纪的启蒙和反启蒙，或者在“他者”的对立中而被定义，如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史的功用自然体现在：通过对不同思想观念之演进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在长时段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助于人们反思今天我们接受某种主导性观念的独断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主导性地位是多种力量的产物，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因此，思想史就给了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和学术资源，有助于我们形成开阔·

的视野，并从这样的唯一性和褊狭性当中解放出来，修正、更新并重建我们的思想观念。由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挖掘它，让其呈现出这些瑰宝的内在价值。上述这一启示只是在历史时间的维度内进行的思考，从空间的维度来说，研究另外一种空间，思想观念的西方特性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从比较的意义上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性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会在“空间转向”的维度下展开，并带有鲜明的比较史研究的取向，这也将是今后学术创新的新起点和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宝贵学术资源。

为此，端正思想史研究的态度，既无需追求读史使人明鉴的古训，也不必为历史研究的无用而自寻烦恼。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可以仅仅出于个体的兴趣，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讨，出于对历史上遗留的多样性瑰宝的好奇和追求。学术研究的动力原不过如此。同样，对于读者而言，对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喜爱，不能仅仅出于某种既定观念的支配，而应切记，思想史研究只是丰富与扩展自己理解社会的视野，进而转化为参与社会实践、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力量，人们不必也不应当试图从思想史研究者的结论中找到一些直接有助于自己的答案。

今天，面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热潮的来临，作为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者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也需要冷静地看到：社会民众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喜爱将是一种更大的推动力，以促使我们这些研究者提升自己研究的水平。平心而论，尽管我们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是在理论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还有很多工作甚至空白需要去做、去填补，例如就欧洲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还肩负着理解其研究范式和研究典范，夯实欧洲思想史研究基础的重任。正基于此，我们才决定组织选编翻译这套欧洲思想史。

在我们选编的这套丛书中，有两本侧重于理论方法，有三本侧重于具体的个案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展开，思想史研究范式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研究对象上从原先重视经典思想家的著作转向研究普通民众的心智，因此文本的构成发生了转换，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宏大的主题，而是普通人的观念。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

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质疑：到底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本丛书中的《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一书就系统介绍了思想史范式转型的内在原因，以及如何在多学科以及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这一转变。

时至今日，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学界已对剑桥学派、概念史等思想史研究范式多有了解，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不断推陈出新、拓展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也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过往的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这一地理空间的话，那么如今，当思想史遇上了全球化，思想史家必须要思考思想史研究如何应对空间的变化，并探求空间要素、空间视域与思想史研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空间扩展是否促成了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同样，在概念史研究中，关于概念的空间流转和再概念化也涉及空间问题。举例来说，当我们把英国或者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概念的时候，今天中国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农民工”的特质来对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进行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将是概念史研究中需要重视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将概念放在不同的新空间中，运用不同空间所形成的经验和资源来处理和理解概念范畴将会扩展出思想史研究的新边界。换句话说，也只有实现了“空间转向”，思想史研究才会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在这一方面，国外同行已做出了领先一步的表率，例如对“帝国”的思想史讨论。

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可以在空间的维度上来理解和表达我们所选择的这套译丛的主题和主旨。例如，当我们把欧洲思想史或者西方思想史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单元时，还需要记住它们内部之间的差异，从空间上讲，需要注意其内部各民族的特性。为此，本丛书特意选择了《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希望在“民族”的空间和特性下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谱系，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成为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

受剑桥学派注重于“语境中的观念”的影响，我们特地选择了关联到欧洲社会体制的两个重要观念——“市场”和“共和主义”——进行翻译介绍。在《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一书中，学者们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空间来考察“市场”这个概念。一旦引入这样的思

想史研究维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市场”概念的历史性以及空间上的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特性，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经济体制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更需要提出的是，此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帮助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市场”的内涵。同样，在学术上，对“市场”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也成为概念史和社会经济史相结合的典型个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共和主义”，直到今天这样的研究热潮仍方兴未艾。《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1649—1776》一书收录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对共和主义思想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时空上涉及诸多国家的诸多历史时期，如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日内瓦的共和主义（日内瓦的共和主义颇为典型）、荷兰的共和主义（荷兰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共和国）、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共和主义思想、美国建国时期的共和主义等。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来考察“共和”概念的流转及再概念化过程将会深化人们对共和主义类型、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理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思想史家吸收了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认同，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而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社会的实体性内容。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之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本着这样的主旨，本译丛选译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易斯的《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本书并不聚焦于纯粹的思想文本，而是从城市空间的安排入手，着重探讨 19 世纪英国的城市政府——例如伦敦、曼彻斯特——如何接受自由的法则并进行自由主义式的治理，从而塑造了自由的城市空间。譬如，他以一系列的个案，例如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图书馆来考察城市图书馆“公共性”的形成。总之，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施政实践，城市才被建构为自由的公共空间，并进而形成自由的城市。

作为主编，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对推进中国的欧洲思想史研究尽绵薄之力，为此，我要感谢很多同仁的帮助。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在本译丛的编选和翻译中付出很多辛劳的译者。他们放下手中繁重的研究任务，转而从事这一没有名利，甚至按照现有量化指标都无法列入科研成果的工作。还要感谢一些虽没有署名但也给予许多帮助的人，如上海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李薇薇，华

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黎英亮博士、英语系冯茵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峰玲博士等。此外，还要对人民出版社的贺畅、卓然等编辑致以谢意，正是她们细致耐心的工作，才保证了本译丛的顺利出版。最后应该感谢复旦大学及其历史系，在得知本译丛即将翻译出版时，他们同意将其列入“985三期”科研项目予以支持。

在中国翻译出版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著作，从而引入另一地域空间的思想表达自有其不同凡响的意义。欧洲同仁所贡献出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势必会为我们的比较、反思并反观自身提供另一种视角，而来自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经验和记忆将有助于人们形成开放的、多样化的思维模式，进而帮助我们自身社会空间的建构。在各种社会性要素全球性流动的今天，思想观念的变革、话语体系的转换对于理解和助推这个飞速变化着的世界必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和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李宏图

2014年1月3日

## 前 言

至少 10 年以来，思想史学家有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他们的领域正在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仍然难以识别。但近年来，来自欧洲的各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实践的涌现，已经搅动了整个历史研究的王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本身的性质，思想史学家是一些对该职业内部的变化特别敏感的晴雨表。确实，他们面对着一个独特的问题，与人类学家所面对的问题类似：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go native*），并变得类似于他们试图以学术的方式加以仔细观察的那个常常令人不安的部落——知识分子本身？

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专注于现代欧洲思想史，但他们明确地或不言明地提出了关于方法和态度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特定时期或特定主题的界限。这样说恐怕并不夸张：本书是一份宣言，不是在发布某种分享信息或纲领的意义上，而是在揭露一套共同的问题和共同关注点的意义上的宣言。让我们考虑一下它们中最突出的一些问题。

在批判理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内容是切题的？那些属于上述思想“学派”的人物（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的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是他们重新对各种问题进行概念化，这对理解历史过程及历史本身的撰写具有种种重要含义。通常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有许多理由对此不屑一顾：这些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的阐述难懂或晦涩费解；这些著作为现实历史研究引入的东西难以捉摸；他们的种种假定或暗示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如何才能阐明这些主张，使其相互发生联系、得到批判性的评价并在研究中得到应用？那些古老的批判方法，诸如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仍然可行吗？更一般地讲，在思想史中描述、阐释（interpretation）

和解释（explanation）的性质是什么？正在对符号学和语言学一般理论的各种新近趋势的视域产生影响的是什么？就伦理学、社会行为或政治学来说，思想史具有任何广泛的含义吗？

什么是思想史与当代社会史的关系？在这个职业内已经对思想史提出最大挑战的正是社会史，这种挑战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统计研究可能揭示出所开设的贴着“思想史”标签的课程数量在最近的过去仍然不变<sup>①</sup>，但相对的增长和绝对令人兴奋的事情似乎经常转向社会史。而且在思想史本身内部，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存在任何思想史特有的问题和方法吗？比如，关于难懂的文本和其他“高雅文化”的人工制品的解释就是思想史特有的研究对象吗？什么类型的问题需要放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交叉点上进行研究？用更实在的措辞，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因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中方法论视角方面的变化后果有哪些？《年鉴》学派曾在重新塑造我们对历史探究的理解中做了大量工作，它的遗产中什么是继续有效的，什么已经死了？全部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加以思考吗？

在把本书呈现给读者时，我们不能自称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作出回答或甚至作出了自己感到满意的处理。无须多言。这本书不代表当前所有现代欧洲思想史研究者的立场，更不用说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者的立场。<sup>②</sup> 但我想我们拥有了一个横截面，可以了解关键性的见解，特别是那些处在阈界位置（liminal position）上的有朝气的老学者（或我们早已熟悉的比较年轻的学者）的见解。在请求海登·怀特为本书写点总结性的思考时，我们的要求是：在他认为适合于提出他视为对这个学科的未来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提及具体的相关文稿。结果，他提供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评价，而且凭自身的分量就是一篇扎实的文章，一篇读者可以作为他们自己思考的一种出发点的文章。

这里的大多数论文开初时都是提交给 1982 年 4 月 24—26 日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一个讨论会的。我们谢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sup>①</sup> 见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载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1980)。

<sup>②</sup> 比如，一些其他视角的表达，见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 John Higham and Paul K. Conkin (Baltimore, 1979)。

for the Humanities) 和康奈尔人文学科协会 (Cornell Society for the Humanities)，还要谢谢康奈尔西方社会计划 (Cornell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和历史学系，该次讨论会因它们的资助才得以召开。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斯蒂文·L. 卡普兰

## 中西思想未尽对话：英美众多大儒对文英汉义生平研究 第八集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 .....	( 1 )
罗歇·夏蒂耶	
第二章 重新思考思想史和阅读文本 .....	( 32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第三章 思想史应该接受语言学转向吗？ .....	( 68 )
——对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的反思	
马丁·杰伊	
第四章 三方面的焦虑：欧洲思想史现状 .....	( 93 )
汉斯·克尔纳	
第五章 福柯思想中的未来：《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 .....	( 119 )
马克·波斯特	
第六章 考古学、解构和思想史 .....	( 133 )
E. M. 亨宁	
第七章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问题 .....	( 173 )
基斯·迈克尔·贝克	

第八章 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大众维度:以世纪末慕尼黑的 戏剧为例 .....	(194)
	彼得·杰拉维奇
第九章 读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	(223)
	戴维·詹姆斯·费舍尔
第十章 思想史中的方法与意识形态:以亨利·亚当斯为例 .....	(250)
	海登·怀特
附录 编者和作者介绍 .....	(280)
索 引 .....	(282)

任何一个学术的图书，尤其尚未明文留置图书馆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古籍，另一种是其著者或译于欧洲。普通读者无从获得有关这些书籍的任何消息，除非他已通过某种途径，而且是不同的途径，得知有关它们的消息。

## 第一章 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

罗歇·夏蒂耶

出于几个原因，思想史提出的一些问题无疑是世上最难处理的事情之一。第一个难题是词汇问题。在历史学科中，没有一个分支与思想史一样，在术语的使用中存在这样一种民族特异性，在引入它们时会碰到这样一种困难，甚至仅仅是把它们译成另一种语言，放入另外一种知识背景中也是这样。<sup>①</sup> 美国的历史编纂学将之分为两类，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总是含混不清，因而始终存在问题。第一类叫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随着本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而出现，由于佩里·米勒的努力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第二类叫做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由 A. O. 洛夫乔伊将之发展成一门学科，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纲领和研究步骤，并有了独立的学科阵地(洛夫乔伊在 1940 年创办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然而这两种类型在欧洲各国都没有取得较好的立足点：在德国，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占据统治地位；在意大利，即使在德利奥·坎蒂莫里的著作中也未出现思想史(*storia intellectuelle*)这个概念。在法国，无论是作为一种概念还是一门学科，观念史(*histoire des idées*)都很难存在(事实上，诸如让·埃拉尔这样的一些文学史家曾谨慎而有保留地认为自己从事过这种研究)。“思想史”这个称谓似乎出现得太晚，因此既无法取代传统术语(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也没有对主要由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提出的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历史心理学(*psychologie historique*)、社会观念史(*histoire sociale des idées*)、社会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等新词汇造成冲击。不过，事物总有正反面，因为“心态史”这个术语在法语以外的语言中似乎有些笨拙，难以出口，现在仍然是造成极大混乱的根源。

<sup>①</sup> 见 Felix Gilbert, “Intellectual History: Its Aims and Methods”, *Daedalus*, 100 (Winter 1971), 80~97，尤其是第 80~84 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不加翻译地保留这种表达方式,并因此承认各个民族在考虑历史问题时必然存在特定方式的刻板性。相对于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词汇的确定性,思想史面对的是描述它的词汇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每个民族的历史编纂学都有自身概念形成的过程;在加入表演的每一个不同的观念中,在外国人看来,任一个观念都难以与其贴近的观念区分开来。

那么,看来存在如此根本性区别的这些词汇,其背后所表达的概念都是相似的吗?或者换个说法,它们如此多样地加以表述的对象都是某个独一无二的、同质的观念吗?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不可能的了。比如,考虑一下两种分类的尝试。在让·埃拉尔看来,“观念史”应该涵盖三种历史——“大世界体系中个体的历史,由舆论所表达的集体的和各种各样事实的历史,各种思想和感情形态的结构史”。<sup>①</sup> 在罗伯特·达恩顿看来,“思想史”包括“观念史(对通常属于哲学范畴的系统思想的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对日常思想、舆论倾向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对意识形态和观念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对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sup>②</sup> 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这些定义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所谓的思想史领域实际上包含了所有思想形式,其研究对象和目的并非先验地比社会史或经济史更精确。

比分类和定义更重要的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史学家对这个巨大而模糊的领地加以分类的方法或多种方法;以及怎样处理由此组成的各个观察单元。困于既是思想的又是制度的对立面的中间,这两种不同分类的每一种都确定它自己的对象或目标、它的概念工具和它的方法论。然而,每一种分类法,无论是否明确提出,都涵盖了整个历史领域,都给各自声称要占据的历史领域划定界限,确定不予考虑的地方或不给其他学科或分支占据的地方。各种特定词汇的不确定性和门类区分无疑与学科内部或跨学科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这种竞争的特点对每种智力力量的领域都是独特的,其利害关系是某种霸权地位,尤其是语言的霸权。所以,我们将转向一些对立的关系,这些关系塑造了法国思想史

<sup>①</sup> Jean Ehrard, “Histoire des idées et histoire littéraire,” *Problèmes et méthodes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Paris, 1974), 68—80.

<sup>②</sup>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1980), 337.

并使其产生分歧。我尝试着提出这些问题，并始终意识到一种双重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缺乏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我无法充分说明这种方法论上的自我对质究竟会有什么制度或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一些现在有可能曲解整个情况的争论，特别是那些从1930年到当前围绕着《年鉴》(Annales)展开的争论。

## 第一代年鉴派和思想史

在20世纪，法国思想史的发展轨迹（这一说法有双重含义：主题或方法论的突变及其在历史学科领域内的地位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本身以外的一种话语的控制，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创造出一种不同的历史书写方法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话语。我们应该从那里开始，尝试去理解年鉴派，尤其是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为何会考虑必须建立思想史。这样做之所以重要，并不是要对此进行某种怀旧式的赞颂，而是因为这些人研究观念史的方法已经成为主流，被史学界仿效，甚至有点放肆地称其为年鉴“学派”。<sup>①</sup>

在费弗尔看来，研究思想史首要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处时代写作历史的方法作出回应。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无论是在1914年以前发表于亨利·贝尔主编的《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的最初一批评论文章，还是“二战”期间及之后发表在《年鉴》上的文章，都体现出这种延续性。例如，1907年和1909年，他在贝尔的杂志上发表的两篇长长的反思性的文章，分别评论了路易·德拉吕埃勒关于比代(Budé)的书和爱德华·德罗兹(Edouard Droz)关于蒲鲁东的著作。费弗尔在这两篇文章里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他那些杰出作品(1929年的《路德》和1942年的《拉伯雷》)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可以把屡屡自相矛盾的、常常混合在一起而且无论如何都是在变化的观念或某种背景(milieu)，用观念(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之类)史所使用的那些传统范畴来归纳吗？费弗尔的回答是，此类

<sup>①</sup> 参看Jacques Revel, “The Annale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Review: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 I*, (Winter-Spring 1978), 9–18, 和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es paradigms des Annales,” *Annales E. S. C.*, 34 (1979), 1360–1376。